

文學與歷史叢書

李商隱詩論稿

藍 于 著

中華書局

文學與歷史叢書

李商隱詩論稿

藍 于 著

中 華 書 局

書 名：李商隱詩論稿

著 者：藍 于

出版者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香港九龍彌敦道450—452號

印刷者：中華商務聯合印刷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

版 次：1975年12月初版

1983年3月重印

©1975 1983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

ISBN 962 231 319 1

目 錄

前言·····	1
願書萬本誦萬遍·····	8
但須鸞鷟巢阿閣，豈假鴟鵂在泮林·····	22
又聞理與亂，在人不在天·····	32
竟緣尊漢相，不早辨胡雛·····	53
惡草雖當路，寒松實挺生·····	70
平生風義兼師友·····	84
欲迴天地入扁舟·····	100
從臣皆半醉，天子正無愁·····	113
附：“春蠶到死絲方盡”·····	123

前 言

記得是梁啟超罷，他認為李商隱的詩，好就好在不容易懂。

李商隱的詩的確比較難懂，一是因為他愛用典，而且有的到現在已成為僻典；一是他不少詩因為在當時有所關礙，不得不隱晦。而且，如他的有些無題詩，主要抒寫個人感情，但求朋友知己了解，當時並不一定想要傳諸後世。

但是，李商隱詩之不好懂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那些腐儒故作玄虛，不肯從字面中求解，而一定要爲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，越解越玄，使上了他們當的人如墮入五里霧中。

正因為有這麼一些腐儒，一千年來造成了一種印象，似乎他一天到晚向人求情，尤其是向令狐綯求情，但求得一官半職，能夠有一天置身清要，飛黃騰達。新舊唐書，尤其是新唐書，順着令狐之流的說法，認為李商隱爲王茂元從事，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兒，在當時的黨爭中是去牛投李，背棄了令狐楚對他的提拔之恩，“放利偷合”；後來的腐儒就抓住這點，把李商隱比較難懂的

詩，甚至本來不難懂而被他們解成難懂的詩，一律解作李商隱向令狐懺悔求饒、希望再蒙提拔的求情詩。於是，李商隱一些真摯的情詩、悼亡詩被歪曲了，不少出於對時局激憤而發的政論詩、諷刺詩、詠史詩，也被埋沒了。

我們不能否認，由於他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，李商隱免不了想做官，因此也的確寫了一些向令狐綯之流求情的肉麻詩，這是他一生的污點。但在他留下來的全部詩篇中，這只是極小的一部分，並不佔重要的地位。反之，他的詩篇儘管比較難懂，而仍然千年來傳誦不息，正由於他的真摯的感情、卓越的見解和超絕的藝術性。

去年六月，我試解李商隱的幾首無題詩，就曾觸及這個問題。但是當時因為對晚唐黨爭沒有去了解，就貿然下斷語，以為李商隱與黨爭沒有多大關係；他之受到令狐綯排斥，可能是他的政治態度與會做官的令狐綯有牴觸。

大半年來，受到國內總結儒法鬥爭的影響與啓發，開始由李商隱的詩為起點，進而研究晚唐的黨爭；自己覺得初步整理出一些頭緒來，開始猜想，晚唐黨爭，同中唐後期的永貞革新是一脈相承的，因而也就帶有儒法鬥爭的性質；儘管到了晚唐，由於唐代的封建統治已到了分崩離析的前夜，代表地主階級一部分的法家也已不可能那

麼旗幟鮮明了。

然而，當時鬥爭的焦點仍然是郡縣與封建之爭、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之爭。而承上啓下的一個關鍵性人物就是裴度。永貞革新派的一位重要人物劉禹錫就曾受到裴度的照顧；後來奉召回京後，也一直同裴度保持密切的關係。裴度平淮西掃除這一連綿半世紀的地方割據之後，曾受到劉禹錫和另一永貞革新派健將柳宗元的歌頌。而後來在唐武宗時堅決鎮壓昭義軍封建割據的宰相李德裕，則又是在文宗朝受到過裴度保薦的一位政治家。李德裕一般被認為是黨爭中李黨的魁首。

至於牛黨，一般都以為從牛僧孺和李宗閔開始。其實，這一派在李逢吉時已萌芽了。反對裴度平淮西的是李逢吉和令狐楚，而李德裕平昭義割據時，又發現李逢吉曾受過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的賄賂，李宗閔則同劉從諫的姪子劉稹有勾結。

在對待太監的問題上，李德裕同裴度的態度基本上是接近的；所以文宗想壓制宦官專橫，裴度就把李德裕推薦給他，可惜他未能用。反之，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李宗閔勾結宦官，捷足先登，當上了宰相。而李德裕則被排出朝廷，任西川節度使；直到他處理吐蕃降將受到牛僧孺的干撓，後來證明李是對的，才又調回京師拜相，把李宗閔

調了出去。

但是，兩年之後，在甘露事變之前，李德裕因爲反對由李訓出任諫官，又被排出朝廷，把李宗閔替了回來。李宗閔再任宰相後，便同甘露事變的這兩個主角——李訓和鄭注——勾結在一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訓又是李逢吉的姪子；李逢吉曾拿出大批金帛珍寶，要李訓去巴結鄭注，以求恢復他自己的宰相職位。

在處理民族問題上，兩派也採取對立的立場。上面提到的吐蕃降將事件，李德裕主張納降，以鞏固西川的防務，並至少部分恢復玄宗以來淪陷於吐蕃的邊庭地區。但是，牛派的牛僧孺却用他當時的宰相權位，反對納降；主要是怕得罪吐蕃的豪帥。

李德裕出任浙西觀察使，不但銳於布政，而且嚴格破除迷信，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。有人推薦浙西處士周息元給敬宗；敬宗好道，馬上把他召入內廷。這個神棍自誇已有幾百歲，認識武則天時的張果、葉靜能。李德裕立即上疏，駁斥其妄。至少有一次，李德裕破除迷信，同令狐楚針鋒相對。當時令狐楚任宣武軍節度使、汴宋毫觀察等使，在他的轄區亳州，出現了所謂“聖水”，能令飲者疾癒，哄動一時，許多老百姓上了當。而令狐楚却還十分得意，上表報喜。

與他相反，李德裕下令禁止浙西的老百姓去取“聖水”，並且上疏朝廷，力闢其荒誕不經。

以上只是略舉幾點，以說明晚唐黨爭中兩派的立場、態度與主張。顯然，牛派是一幫筆底下寫得的進士，只求一切保持不變，維持舊秩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近於儒家；而李德裕等則接近法家的觀點，希望有所作為，能夠重振中央集權，鞏固全國統一，並有所改革。

李商隱實際上從來未隸黨籍。但是，他出身受到令狐楚的獎掖，而後來在甘露事變後思想上又發生了極大的變化，看法上日益接近李德裕一派。他詩中所表現的矛盾情緒，很大一部分是由此而生。這方面，李商隱在他的不少詩篇中表現得很清楚，這裏不必贅言。

最後，我想談一談李商隱同王氏的婚姻。在唐代，婚姻是仕途的重要關鍵之一；我在談無題詩時，也多少受到傳說的影響，以為李商隱娶王氏，多少摻雜着在仕途上能夠得到王茂元奧援的希望。但是，越多讀李商隱的詩，對他的生平知道越多，也就越覺得這種傳說缺乏根據。據舊唐書文苑傳，“王茂元鎮河陽，辟（李商隱）掌書記，得侍御史。茂元愛其才，以子妻之。”新唐書也差不多。說王茂元當時鎮河陽，並說李得侍御史，前人已證其為誤；但最後兩句，與李自己所

作的《重祭外舅文》中“往在涇川，始受殊遇。綢繆之跡，豈無他人？”是完全相合的。由此可見，是王茂元愛李的才華，辟他爲書記，後來才把女兒嫁給他。這件婚事，主動出於王，並非是李商隱存心謀求的。

同一篇文章中，李商隱敘述他同王茂元的關係：“忘名器與貴賤，去形迹於尊卑。語皇王致理之文，考聖哲行藏之旨。每有論次，必蒙褒稱。”但是，李商隱却似乎從來未得到王茂元的提携，而對此他也從無怨言；更可見他從來沒有對他的丈人有所希冀。

至於李同王氏的婚姻，雖然是媒妁之言，但似乎王對李已先有所愛慕。這我在解“颯颯東風細雨來”時已論過（見本書附錄）。在李商隱的另外一些詩中，也不時透露兩人相互愛慕之情。在封建時代，夫妻之間有這樣真摯的感情，即使在詩人之中也是少見的。從這一點上，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隱的爲人。儘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隱，而李與王氏的感情始終如一，這也更說明，一口斷定李婚於王氏，是爲了在仕途中找出路，這完全是荒謬無稽的。因此，我把以前寫的論李商隱幾首無題詩的文章附在書後。裏面部分有關李商隱的論斷，現在看來有很大的片面性；但對那幾首詩所作的解釋，我今天還覺得是對的。所

以把它附在書後，供讀者參考批評；對我自己而言，把一些不正確的地方，保留在這裏，也可以看出我對李商隱的看法的深化過程，有助於對李商隱的進一步的了解。

願書萬本誦萬遍

一年多前，我在討論李商隱的一首《無題》時，曾談到李同令狐楚和他的兒子綯的關係，大胆地作了一個猜測。我當時寫道：“令狐善文，也顯然很欣賞李的詩文。然而，令狐又是一個很會做官的人，圓滑謹慎。至於李，自比‘禰衡之狂’。別的不說，他在詠賈誼時，居然寫出：‘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！’把漢文帝這樣譏諷，顯然是借題發揮；喜歡煉丹求長生之術的唐代皇帝和一些大臣，是決不會高興的。像令狐綯這樣一個會做官的人，又怎麼肯把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狂士推薦給皇帝呢？”

近來，細讀李商隱的長詩《韓碑》和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韻》，再參閱新、舊唐書，以及其他史料，開始覺得問題並不那麼簡單；在當時，李商隱確有鮮明的政治見解，而且他的見解同令狐楚父子的見解顯然是針鋒相對的。

在《韓碑》一詩中，李商隱捧了韓愈幾句：“公之斯文若元氣，先時已入人肝脾。湯盤孔鼎有述作，今無其器存其辭。”於是，我們往往把這

首詩的重點看錯了，忽畧了他的政治意義。在當時，這首詩如果不是同它所詠的史事相去已有十幾年，簡直可以認為是一首抗議詩，一幅大字報。

韓愈的《平淮西碑》所記的史事，是中唐後期爲了鞏固中央集權而對藩鎮所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。

唐朝的藩鎮——也即節度使制度——開始於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府兵制破壞以後。唐睿宗時已有節度使的官名，到了唐玄宗，在邊境上設了十個節度使，成爲“安史之亂”的一個起因。“安史之亂”平定之後，藩鎮割據並沒有消除，安祿山、史思明等一些降將，也紛紛割據稱雄，連內地也開始有了節度使。

肅宗寶應元年（公元七六二年），淮西節度使王仲升爲安史餘黨所俘，安史降將李忠臣代爲節度使，鎮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。後來李忠臣內部變亂，他逃到長安；唐德宗即位後月餘（公元七七九年），任命原李忠臣部將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。德宗貞元二年（公元七八六年），李希烈爲部將陳仙奇毒死，陳被承認爲淮西節度使。但不久之後，李希烈的另一部將吳少誠又殺了陳仙奇，自稱留後，又得到唐朝的任命爲節度使。吳少誠於憲宗元和四年（公元八〇九年）死，他的從弟少陽繼之，也得到了唐朝的承認。

元和九年（公元八一四年），少陽死，子元濟自稱留後。從寶應元年到那時，淮西割據已近五十二年；所以《韓碑》中有“淮西有賊五十載，封狼生羆羆生羆。”

但是，這一次唐朝的中央政府不肯妥協了；公元八一五年，唐憲宗任命力排衆議、堅決主張出兵鎮壓的裴度爲宰相，統領六道兵馬向蔡州進發。裴度堅決奏請廢除了宦官監陣的制度，統一了指揮；在各路配合之下，將軍李愬攻入蔡州，擒獲吳元濟，消滅了淮西五十多年的割據局面。詩中“愬、武、古、通作爪牙”，就是指當時的四位指揮官：唐鄧隨節度使李愬、淮西都統韓弘的兒子韓公武、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和壽州團練使李文通。

這一勝利使今河北、河南、山東地區的藩鎮大爲恐慌。他們本來同淮西是彼此勾結的，現在只好先後上表請歸順、自新。唐憲宗又乘勢命令魏博鎮的田弘正討伐淄青鎮的李師道，於公元八一九年殺了李師道。至此，藩鎮的割據受到了致命的打擊，唐朝又恢復了不穩定的統一局面。

淮西平定之後，憲宗命令韓愈寫《平淮西碑》，刻石記功。韓愈在思想上是唯心論的儒家，在政治上是個機會主義者。廷議平定淮西時，以另一宰相李逢吉爲首的多數派是反對這一決策

的。韓愈當時是太子右庶子，支持裴度。所以出兵之議決定後，裴度兼淮西宣慰處置使並兼彰義軍（淮西）節度使，就向德宗要了韓愈作行軍司馬。勝利歸來後，韓愈也邀功任刑部侍郎，並奉命寫平淮西碑。

但是，不久之後，有人提了意見，憲宗又下詔把韓愈的文磨掉，命翰林學士段文昌另撰平淮西文勒石。

這顯然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。李商隱的《韓碑》詩就對這件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慨。他大呼“嗚呼聖皇及聖相，相與烜赫流淳熙。”而且公然表示，你要磨掉，我却要保留；“願書萬本誦萬遍，口角流沫右手胝；傳之七十有二代，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！”

這個政治事件究竟是怎樣引起的呢？只有舊唐書的《韓愈傳》有如下的記載：

“仍詔愈撰平淮西碑，其辭多叙裴度事。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，李愬功第一。愬不平之；愬妻出入禁中，因訴碑辭不實，詔令磨愈文；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。”

但是，新唐書並沒有有關的記載。宋刊的韓昌黎集的諸家注中，引舊唐書，但在“愬妻”之下有“唐安公主也”五字。清刻《李義山詩集》的箋注引《舊唐書·韓愈傳》亦同。

爲什麼原文沒有這五個字，而引文却有呢？要說宋人引一二百年前後晉的著作，而憑空加上這五個字去，可能性是不大的。如果這樣，則另一個可能就是，原來舊唐書是有這五個字的，後來刊印時，有人發現李愬不可能娶唐安公主，就把這五個字刪了。歐陽修編撰新唐書時，也覺得不可信，所以根本沒有提起這件事。

事實是：李愬的確不可能娶唐安公主。

《新唐書·諸公主列傳》中錄德宗十一女，長女“韓國貞穆公主，昭德皇后所生，幼謹孝，帝愛之，始封唐安，將下嫁秘書少監韋宥，未克而（朱）泚亂，從至城固，薨。加封諡。”

《舊唐書·德宗本紀》建中四年（公元七八三年）：“車駕次城固，唐安公主薨。”貞元十五年（公元七九九年）：“故唐安公主賜諡莊穆公主。賜諡自唐安始也。”諡法中差一字，可能是舊唐書有誤。諡“貞穆”，是因爲她未嫁而死。

李愬死於穆宗長慶元年（公元八二一年），時年四十九歲；上推至建中四年，他只有十一歲，決不能尙公主。而且，唐安公主已死於建中四年（公元七八三年），平淮西碑成於元和十三年（公元八一八年），唐安公主已死三十五年，決不可能又“出入禁中”，來替李愬喊冤。

顯然，李愬也不可能尙過公主。《新唐書·

諸公主列傳》中，沒有一個公主是嫁給李愬的。新舊兩唐書李愬傳中，也沒有說他尚公主。李愬是唐德宗時“勤王救駕”的大功臣李晟的兒子，他本人又以軍功任“檢校尚書左僕射，兼襄州刺史，山南東道節度，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，上柱國，封涼國公，食邑三千戶，食實封五百戶”，如果尚過公主，是不可能不見史傳的。

那麼，李商隱詩中所謂“讒之天子言其私”的又是誰呢？

讓我們再退回到元和十年，當時唐憲宗同裴度，是力排衆議，才定下了進攻淮西的決策的。當時反對平淮西的，有宦官，有以宰相李逢吉爲首的朝官，也有同吳元濟勾結的今河南、河北地區的藩鎮，尤其是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。他不惜買兇刺殺當時支持平淮西的另一宰相武元衡，並企圖謀殺裴度。在京師伏擊，刃三進，斷度靴，砍他的背，割裂了內衣，傷了他的頭。他靠厚氈的蔽護得不死。但這一切沒有嚇倒了裴度，他反而更堅決進行平淮西的軍事部署。

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，元和十二年出征淮西，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，由令狐楚代皇帝草制，用辭有所不合。後來查出令狐楚同李逢吉有勾結，都反對裴度征淮西的計劃。於是，憲宗罷去了李逢吉，停了令狐楚的學士職位，只任中